

毛周合作：历史的必然选择

汪 浩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毛泽东关于革命领导权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致看法,为他们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毛周合作40多年,至死不渝,原因很多,但实现共产主义之志,走农村包围城市之道,这“志同道合”,才是其中最本质的原因。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致意见。在扶生死、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毛周相互选择对方,这成了毛周合作领导体制的真正起点。

关键词:毛泽东;周恩来;合作;领导体制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6)05-0621-06

遵义会议前,在探索革命道路,选择自己的领袖,通过优化组合形成优势互补的领袖群体这一历史性选择的过程中,周恩来和毛泽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已经有了比较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认识。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实践中总结出大致相同的经验,为以后他们的成功合作奠定了基础。

一、谁主沉浮——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失败。除了外部原因外,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执行一条妥协退让的错误路线是直接原因。陈独秀的错误根源,是背离了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除了国际背景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革命的性质,二是统一战线,三是革命领导权。陈独秀分不清资产阶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兜售“二次革命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融共、排共、反共阴谋,一直忍让妥协;这二者的核心问题是革命领导权。20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走资本主义之路已经不可能,只能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唯一的选择。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最重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革命领导权问题。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中共较早察觉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和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人,他们既积极组织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又反对陈独秀的妥协退让。1925年廖仲恺被害,周恩来告诫《勿忘党仇》,他叮嘱聂荣臻等同志,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项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们限制^{[1]120-121}。1926年1月中山舰事件前夕,周恩来发觉蒋介石排共反共阴谋,同陈延年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商定,准备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对策,组织反击,但陈独秀却没有同意。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前几天,周恩来发现前兆,报告苏联顾问,被视同儿戏。事件当天,周恩来、毛泽东在李富春家商议,主张反击。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等讨论反击计划,报请中央决定。陈独秀不予支持,相反却决定接受蒋介石限共、排共的条件。连陈独秀的儿子,时任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也气极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1]132-133}。

周恩来在反击国民党右派污蔑共产党“闹分裂”有关谎言时指出:“各被压迫的阶级的共

收稿日期:2005-01-20

作者简介:汪浩(1942),男,江苏涟水人,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哲学、党史党建研究。

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有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他指出是国民党右派在闹分裂,而共产党人,自然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2]24}。

蒋介石“4·12”叛变后,周恩来等人试图组织工人武装予以反击。由于陈独秀的妥协,可惜为时已晚。他与赵世炎、罗亦农等人在给中央的电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中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上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成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2]7}。“4·12”事变后的4月18日,周在有关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批评“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他还严正指出:“此次运动(共产国际)东方局也要负责”,并提出建议要注意以后“党的统一指导问题”^{[1]163}。

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首先对国共合作有深刻的理解。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对中国革命提出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3]91-92}。

国共合作时,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此间他以中共中央局秘书身份起草并与陈独秀合署一系列文件。其中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五号,第一次使用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提出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授人以柄;又要“为国民革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3]96-97},提出了针对右派的正确的指导原则。1925年11月西山

会议派公开排共、反共,毛泽东利用其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之便,在宣传上做了维护统一战线、反对右派破坏的许多工作。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最早提出将其分为左翼、右翼,并加以区别对待的重要理论。他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多功能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3]100}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创办《政治周报》,加强反击新老右派的舆论工作。中山舰事件当天,他与陈延年向苏联顾问提出反击建议,遭拒绝,随后又在李富春家与周恩来商量对策。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顾问——引者注),他说不能破裂。”^{[3]104-105}

总之,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与毛泽东,虽然所处的岗位不同,但他们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关于统一战线,特别是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已经有了大致相同的认识和行动。十几年后,周恩来回忆说:“我们党的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可以说‘左’倾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2]218}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毛泽东关于革命性质、任务、统一战线,特别是关于革命领导权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认识与实践方面的一致,为他们将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志同道合——关于革命道路的问题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那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革命道路问题。八七会议,我们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然而这个总方针如何实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严峻考验。

周恩来是中共较早认识革命武装重要性,并是革命武装的创始人和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他早在1922年就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4]。大革命中,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两次东征、创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组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

斗争的经验。在中共早期,他的这些经验是极为宝贵的,后来党派他领导南昌起义及以后长期担任党的军委负责人与这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错误,对八七会议做出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总方针的决策,起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他关于“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警示了全党。难怪瞿秋白同志曾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3]144}

党的六大,正确地总结了毛泽东等同志创建农村根据地的经验,认为农村中“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的斗争方式”^[5],肯定中国农村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但仍认为要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民武装斗争和武装割据认识不足。党内如何在贯彻八七会议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总方针方面,还存在严重分歧。一些人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迷恋城市中心论,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攻打中心城市”这些“左”的口号很感兴趣。他们一方面号召土地革命,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又担心游击队会把农民“最后一个老母鸡吃了”^{[6]142}而遭到农民的反对,怕共产党到农村去会变质。这固然与共产国际一些人的认识有关,但究其根源还在于这些领导者本身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中国农民问题认识肤浅,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对土地革命的依存关系。在落后闭塞、文盲充斥的旧中国,“请问谁有本事在一个早晨把全国人民动员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总暴动?这完全是一句壮观的空话”^{[6]128}。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坚持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婉拒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7],一留一拒,都是基于“城市中心”、“农民问题”这两大问题的不同认识。从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博古都没有认识到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在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是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一个半殖民地,封建军阀即“统治阶级混战”,这就是“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及其相伴随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

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与发展”^[8]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在实践中开创了土地革命与农民游击战争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以此为依托,以打土豪、分田地来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以武装民众,开展农民游击战争,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并“傍着发展”根据地,“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土地革命,如此“波浪式地向前发展”^{[3]214}这一套很有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宝贵经验,毛泽东1930年就已经作过比较系统的总结。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选择这一道路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逼上梁山”。“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3]279-271}。

周恩来因组织南昌起义,没有参加八七会议。但他坚决地贯彻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他与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同志,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果断地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中共六大上,周恩来在他所作的军事报告中,肯定大革命时期党在军事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为了联合战线“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结果,“一旦蒋介石叛变”就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1]212}。

八七会议以后,周恩来同瞿秋白一样,虽然赞赏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赞同毛泽东关于枪杆子中出政权的论断,但在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这一总方针方面,一时间跳不出城市中心和对农民问题缺乏深入认识的误区,加上共产国际方面的影响,他在近两年的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在把自己的城市革命观点推行到”“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在当时的判断是有失误的”^{[9]110}。比如1929年2月中央致红四军的信(“二月来信”),要调朱、毛离开红军,就是其具体表现。朱毛红军会师,由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如何建军问题上存在分歧,两支部队会师后又磨合的复杂问题,加上中央特派员不当的指导,导致红四军领导层朱、毛、陈之间的失和,发生了排挤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当时主持

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对前方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他根据变化的情况,特别是他从毛泽东的抗辩信中认识到调朱毛离开红军显然失误。8月,陈毅来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后,周恩来与李立三、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并起草了给红四军的信(“九月来信”),彻底纠正“二月来信”的错误,着重支持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建军原则的基本思想。“九月来信”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红军和根据地必将能够坚持和发展,并由此得出一个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2]32}这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见诸中央文件的最早概括。这一有着决定中国历史命运之意义的革命道路,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坚持农村游击战争所创造,由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等人最早概括出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周恩来、毛泽东这两位历史巨人,此时虽然个人交往并不深厚,但他们的共产主义之志,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道,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与实践,已经志同道合了。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近半个世纪亲密合作,至死不渝,这一历史奇迹,纵然因素多多,但“志同道合”才是其中最本质的。

三、生死抉择——关于革命的战略与战术问题

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发展,苏维埃人民政权的建立,必然导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军事“围剿”,必然要通过军事上的较量来决定命运。随着革命领导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解决,根据地与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武装斗争,军事较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随着军事较量成为革命的中心问题,革命阵营内部,军事战略与战术问题的地位也随之凸显出来。在3年根据地创建以及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又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并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壮大了红军,扩大了根据地。但就在此时我们党内领导层发生了

排挤毛泽东对红军领导的严重失误。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1932年5月长汀会议,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毛一贯反对国际路线,反对临时中央“积极进攻路线”“攻打中心城市”,以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为由,压制打击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思想,指责毛理论上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根据地问题上“傍着发展是右倾保守”,军事问题上指责古田会议确立起来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传统”,声称对毛泽东“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要作最残酷的斗争”^{[3]282}。压制、排挤造成毛泽东两次称病疗养。宁都会议后,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这不仅是对毛个人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丧失。

1964年,朱德旧地重游,回忆毛当年的“正确主张,未被采纳”,十分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自注此诗说:“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3]289-290} 聂荣臻亲历执行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攻打中心城市”赣州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出击求巩固,远袭敌力量薄弱的漳州两次典型战役,后来回忆说:“打赣州,没有打下,吃了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错误。”^{[3]331}

1935年叛变投敌的原红军将领龚楚50年代在香港出版《我与红军》一书,大肆攻击周恩来,说周恩来到苏区衔“左”倾中央之命“清算与斗争”毛泽东,他到苏区夺了毛泽东的党权与军权。美国名记者索尔兹伯里也提出:“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阴谋。”^{[10]150} 一些港台研究者也就此凑热闹。近十多年来,许多专家就此问题作了深入

研究,加上有关资料的公开,现已得出如下共识:“索氏的第一句话基本正确,但不是‘如果’,而是找不出任何证据来,‘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索氏第二句话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参与反对此种阴谋’。”^{[11]126}事实说明打击排挤毛泽东,致使其被剥夺对红军的领导权,是临时中央及其支持者,而不是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尽可能维护,显然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重视的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指挥红军其基本的战略和战术思想,与毛泽东常趋一致。比如“周恩来到达苏区前曾主张进攻赣州。他到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估量,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1]304};1932年春,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以“出击求巩固”,“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的”的建议,红军远袭龙岩、漳州,取得大胜利;同年8月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其攻打中心城市的压力,再次听取毛泽东外线作战以求巩固,向北进军一举夺得乐安、宜黄战役的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已被剥夺军权,但周恩来与朱德仍然坚持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战术,与苏区中央局后方同志以及临时中央就进攻中心城市,还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再次发生争论。“这个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宁都会议那场争论的直接继续。”^{[1]320}周恩来、朱德抵制了错误指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有决定性意义的黄陂、草台冈两大战役的重大胜利,创造了诱敌深入,预设战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光辉战例和首创红军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宝贵经验。

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两年多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指挥原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他提出以少数兵力牵制多数敌人,“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兵力”以保证有把握歼灭敌人;在敌以要塞为支点情况下,要在敌要塞间隙中开展游击战原则;军民结合,正规红军与红色游击队相结合原则;政治工作保障与后勤支援原则等^{[1]326}。可惜由于他的战略思想与临时中央格格不入,1933年初,博古、李德进入苏区后,李德的独断专行代替了由周恩来树立起来的军委的集体领导,1934年初,在“统一后方”的名义下,周恩来被调回瑞金,失

去了对前线红军的指挥权。即使后来是“三人团”成员,他也仅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据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回忆:此间周恩来曾与李德进行多次争论,他不同意李德强调“正规军”打“阵地战”,以“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攻”。他主张以第四次反“围剿”创造的“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它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的机动的兵力,以粉碎敌人进攻”^{[1]338}。他的正确主张不被李德、博古采纳,临时中央错误的战略战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只剩下大转移这一条路了。

“人们从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同志。”^{[12]111}周恩来是中共这一类领袖人物的代表。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开始尤其是湘江战役后,李德因众怨已无法实施指挥,博古也势气大伤,“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沉着冷静,支撑困难局面”^[13]。在此情况下,他根据广大指战员反对“左”的军事路线的情绪,不顾李德的责难,在通道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红军改向川黔、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建议。周恩来使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有了发言权。接着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实现了通道改向、黎平转兵。刘伯承后来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4]应特别指出的是,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为遵义会议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12]34}。1935年元旦政治局猴场会议,又排除了李德对军队的领导权,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以上事实说明周恩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毛泽东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做出了决定性的重大贡献。

遵义会议是依据黎平会议决议召开的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经验教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做主报告,他竭力为错误的领导和指挥辩护;周恩来做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洛甫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反报告,随后毛泽东作

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评,阐述了中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指明了今后的方向。他的发言成了会议真正的主报告。后来发现的陈云同志在长征途中整理的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有这样的记录:“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会后不久,毛泽东曾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5],“显然,周恩来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能取得胜利,有着重要作用”^{[1] 326-328}。遵义会议上,“周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毛观点正确,我们应当听他的”^{[9] 115}。“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1] 349}

金冲及先生说得好:“从宁都会会议前夕前方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一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同毛泽东基本一致,而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们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因此,在这个危急时刻和随后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能同毛泽东站在一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是很自然的。”^{[1] 346-347}

在党、红军、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系于一瞬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历史性地选择了毛泽东。有人曾指出,周恩来一生,有数次机会,可以利用他在党和红军内的影响,谋求他个人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但豁达大度、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着想的周恩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真理的代表者毛泽东。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抉择!后来周恩来回忆说,“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12] 61}!

周恩来这一历史性抉择,是贤者之举。周恩来推举当时地位和影响都不如他的毛泽东,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确定的毛周合作关系“决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9] 300},这是除非圣贤而非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是那些个人野心家们所不能理解的。周恩来选择毛泽东更是智者之举。迪克·威尔逊曾分析说:“周恩来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中国农民革命所提出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领袖。”^{[9] 301}毛泽东“至少

在革命军事的第一阶段要比他强”^[16]。其次,党内一些老同志后来有一共识“看来只有毛泽东能够对付蒋介石,其他人不行”^{[6] 130}。就是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来看,周恩来是中共仅逊于毛泽东的军事家,“他让给更内行的人对革命有利”^[17]。“作嫁怪依拙,急流让尔贤”,周恩来推荐毛泽东,已被历史证明不仅是圣贤之举,更是贵有自知之明的智者之举。

在周恩来历史性地选择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也积极主动地选择了周恩来。长征开始前夕,毛泽东主动要求“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3] 330-331};张闻天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过湘江时,毛对周恩来说:咱们一起过江^{[11] 345},毛泽东开始了如索尔兹伯里所说的“担架上的阴谋”。据贺子珍回忆,毛当时曾对她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8]在红军和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方面做“左”的路线的分化瓦解工作,主动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另一方面又注意争取一贯同情、支持他的周恩来的支持,原因是这三人在当时都是有关键性影响的人,而张、王、毛同因身体不好,需要担架,这就为毛主动争取周、张、王,首先从张、王开始提供了机会。而争取张、王对错误路线的反戈一击,最具说服力和影响力。遵义会议的成功,固然是历史之必然,但也是毛泽东这一斗争策略的成功,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作生死攸关抉择的成功,也是周、张、王在关键时刻,在关于领导权,特别是军事领导权这一关键问题上,选择毛泽东这一生死抉择的成功。从此,毛泽东、周恩来摆脱我们党迷信国际路线“左”的束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开始了“走自己的路”的40多年的成功合作。

正如有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9] 116}。遵义会议,在决生死、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在军事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上,毛周相互选择对方,这一生死抉择,成了毛周合作领导体制的真正起点,从此,中国革命就有了希望。 < (下转第 639 页)

在意文章的形式)和作文能力弱的学生。教师要每一个学生都坚信自己能够写出好文章,要让每一个心灵都能享受作文的成功,实现当“作家”的理想。

4、发展性。学生不是诗人、作家,学生的写作也不是纯文学的创作。作为教师,应该宽容学生的写作质量,评价应该多元化。教师评价时要因人而异,注意横向与纵向比较。尤其在关注学生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水平时,教师应着重肯定学生在现有基础上的努力和成绩,从而让学生看到成绩,增加写作的自信。

在实际操作中,老师可以进一步发挥网络的作用(开始最好在校园网上进行),让更多的人参与交流,例如其他老师、本班同学、外班同学,甚至校外人员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说,每一个作者都同时是读者、评判者。除此之外,在网上,学生可以对别人的评价进行及时的反馈,对方还可以再回帖,这就形成了一种互动的状态。这样才有思想的撞击,才有灵感的火花。

在写作模式上,目前出现的“自主作文”、“生活作文”等很多模式着重于突出写作的内

容。但在写作活动的形式上,我们可以借鉴网络写作:独立与合作相结合。写作是一种个体的脑力劳动。整个写作活动中,作者(个体)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的素质、修养和能力(观察、想象、思维、语言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的写作活动,决定其所写文章的质量。而在与别人合作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兴趣、素质、修养会受到同伴潜移默化的影响,其能力也会得到锻炼和提高。◁

参考文献:

- [1] 欧阳友权. 话语平权的新民间文化[J]. 社会科学辑刊, 2004(5): 133-136.
- [2] 文学报记者. 如何看待网络小说及其前景[N]. 文汇报, 1997-07-08(1).
- [3] 吴春风. 在开放中教学 在写作中放飞[J]. 中学作文教学研究, 2005(7-8): 72-74.
- [4] 高东生. 让网络推进作文新课改[J]. 语文建设, 2005(1): 35-36.

责任编辑: 张 超

(上接第 626 页)

参考文献:

- [1] 金冲及. 周恩来传: 1898—1949: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2] 周恩来选集: 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3] 金冲及. 毛泽东传: 1893—1949: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4] 飞飞. 评胡适的“努力”[J]. 少年, 1922(6).
- [5] 中共六大决议案[M] //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 上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43.
- [6] 冯建辉.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7] 谭震林. 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M]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下.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10.
- [8] 毛泽东.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M] //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98.
- [9] [美] 迪克·威尔逊. 周恩来传[M]. 封长虹, 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 [10]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长征——前所未有的

故事[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 [11] 黄少群.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评[M] // 李海文. 周恩来研究述评.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 [12]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央档案馆. 遵义会议文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3] 程中原, 夏杏珍. 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43.
- [14] 贵州社会科学杂志社, 贵州省博物馆.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G]. 贵阳: 贵州社会科学院, 1983: 86.
- [15] 李聚奎. 遵义会议前后[M] // 星火燎原: 二.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53.
- [16] 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 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98.
- [17] 刘济生. 解读周恩来[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287.
- [18] 王行娟. 贺子珍的路[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85: 194-195.

责任编辑: 张 超

on the way" of the historic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modernity.

Key words: W. Harvey; Movement of Heart and Blood; scientific truth; Mechanism; life mystery

View about "The Leading System of Mao Ze dong and Zhou Er lai"

—Response to Wang Hao

LIU Ji sheng

(School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Innermongonia Nationality University, Tongliao, Innermongonia 028043, China)

Abstract: The leading system of Mao Ze dong and Zhou Er lai put forward by Mr. Wang Hao is not exist from the nor mology aspect and unreasonable from the objective facts. In spite of their long term cooperation between Mao Ze dong and Zhou Er lai, they disagreed each other sometimes and even produced great difference. The leading system is not demor cratic, just like historical oligarchy, which should not be advocated or regarded as the value object of the Party construc tion and the state system.

Key words: the leading system between Mao Ze dong and Zhou Er lai; cooperation; difference; oligarchy; value objec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ao Ze dong and Zhou Er lai: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WANG Hao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uaian,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agreement on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about revolutionary hegemony makes a basi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Mao Ze dong and Zhou Er lai. The most essential reason is to keep in the same camp. All the contributions of Zunyi Conference lie in the result. At the key moment to choose living or death, the two leaders reached mutral privities. Therefore the leading system of Mao Ze dong cooperating with Zhou Er lai comes into being.

Key words: Mao Ze dong; Zhou Er lai; cooperation; leading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etwork Political Culture

LI 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Abstract: Network adds new connotation to political culture. Varied political cultures permeate, struggle and influence mutually, transforming and integrating heterogeneous cult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t is greatly significant to grasp the tendency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etwork political culture and further overcome the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Network political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 New Rural Economical Relations after Township Enterprises Reform of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HU Tong gong

(College of Busines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After complementing the township Enterprises reform, the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have become differe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which cause the change of southern Jiangsu's rural economical relations and form new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enterprises and town government, villager committe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farmers. The new economical relations are the market economy of town and the expans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the rural areas of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township enterprises; reform; new economical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Banditry Expansion in the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Ji r l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uaian, Jiangsu 223300, China)

Abstract: The banditry in the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was very serious, and tended to expand quickl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his problem resulted from several factors. The political disorder brought a social crisis since the founding of ROC. The frequent disasters made the formidable living for the populace. A large number of var grants came into being becau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landholdings. The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was involved in the tough civil wars. The banditry expansion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 society and economy of the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and became the symbol of the social anomie.

Key words: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banditry expansion; social anomie

The Development of Abbey Agriculture in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Western Europe Religious Movement

YONG Zheng j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uaian, Jiangsu 223300, China)

Abstract: n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Western Europe Religious M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bbey agriculture was very fast. The land was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abbey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coexistence of mixed avocations as the simulative force; and the 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land management as its internal momentum.

Key words: abbey agriculture; land; coexistence of mixed avocations; 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land management